

元末明初南京幕府门初探

周 源

提 要：幕府门是元末明初南京最主要的城门之一。幕府门最初作为吴王朱元璋所建设的新城城门存在，其性质是王城门，明朝开国后才成为京城门。幕府门位于新城北墙之中，推测在今天南京的鼓楼岗上，明初随着新城北墙的拆除而消失。对幕府门性质、地点与存废时间的探讨，是新城城门研究的首次尝试。

关键词：南京 幕府门 新城城门

幕府门是元末明初南京主要的城门之一，然而除了史料所载洪武十年（1377）被革除外，其具体信息几乎一片空白。本文尝试从问题由来、性质推测、地点考证、消失原因四个方面对幕府门的基本情况做一初步探究。

一 幕府门的问题由来

幕府门问题来自文献中对南京幕府、金陵二门革除的记载，洪武十年八月癸酉“革在京幕府、金陵二门”^①。这段史料虽简略，却非常重要。因为如此正式记录两座“在京”城门的革除，这在《明太祖实录》中还是首次，显示出幕府、金陵二门的重要性。然而正是记录的简略，所以带来了三大难题，第一，幕府、金陵门性质如何？第二，幕府、金陵门具体位置在哪？第三，幕府、金陵门为何被革除？解决了这三大难题，也就初步解决了幕府、金陵门的历史之谜，这对厘清明初南京城墙与城门的建设过程也很有意义。

可惜史料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案，几乎所有官私文献在介绍明初京城门时都以洪武中期定型以后的13座城门为主。代表性文献如《洪武京城图志》^②、《金陵古今图考》^③、《大明会典》^④、《明史》^⑤、《客座赘语》^⑥、《白下琐言》^⑦等。幕府、金陵门似乎已被历史所遗忘。

对于幕府、金陵门的研究，学者们除直接引用《明太祖实录》记载外^⑧，也有学者对京城城门曾在洪武年间发生过的一些变化进行思考，认为“除了洪武后期南京城墙定制以后的13座城门外，还有被称之为‘幕府’‘金陵’的两座城门，迄今不明在哪里，为何又被废除”。在做

① 《明太祖实录》卷114，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第1880页。

② 参见礼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全书》，南京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甲编，第8册，第33页。

③ 参见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④ 参见申时行等修，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第4册），《续修四库全书》，1996年，第256页。

⑤ 参见《明史》卷40，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910页。

⑥ 参见顾起元撰，吴福林点校：《客座赘语》卷6，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

⑦ 参见甘熙撰，邓振明点校：《白下琐言》卷2，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⑧ 如顾炎武记载：“十年八月癸酉，革在京幕府、金陵二门”（顾炎武撰，胡萧白点校：《建康古今记》，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2页）；《南京建置志》第七章中说“‘十三门’的格局也是经历一些变化才定下来的，《明实录》载：洪武‘十年八月癸酉革在京幕府、金陵二门’，可知先曾开有此二门，后废”（马伯伦主编：《南京建置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

出初步判断后,认为“这两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①。

前辈学者之所以没有彻底解决幕府、金陵门难题,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史料与实物证据的缺乏。有鉴于此,笔者拟扩大搜索范围,在继续发掘史料与实物的基础上,将明初文学材料纳入考察范围。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在幕府、金陵二门中,金陵门尚不具备进一步探讨的条件,而幕府门资料相对丰富,对其三大难题探讨的时机已经成熟。笔者即试图以幕府门研究为契机,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同时,完成前辈学者所期待“进一步考证”的任务,也为将来对金陵门的探讨打下基础。

二 幕府门的性质推测

关于幕府门的性质,由于史料中明确提及是“在京”城门,鉴于洪武十年时,南京四重城垣中的外郭尚未建设^②,宫城与皇城城门名在史料中也有准确记载^③,因此诸多学者认为它是京城城门应当不错。^④然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洪武十年被革除之时幕府门的京城城门性质并不能代表其始建之时依然如此,除非能够证明幕府门始建于大明开国、南京被立为都城之后。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弄清楚幕府门始建时间的话,那么它的性质将更加复杂,远远不仅是京城城门那么简单。

笔者认为,对于幕府门性质的考察应当首先从其存在的时间着手,最大可能的钩沉出它所遗存于文献与实物之中的时间线索,只有将幕府门的存在时间弄清楚,才能对它的始建年代做一个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判断。当推测出它的始建时间后,再结合它在时间年表中的主要用途,城门性质就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楚的结论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笔者在文献和实物材料中共找出6条可判断幕府门存在时间的证据。下文逐一分析:

(一) 从文献中考察幕府门的存在时间

从文献的角度来说,有3条史料和2条诗文可以推测出幕府门的存在时间。

先看史料:

史料一:

(洪武八年三月)己巳,置行用四库于应天府聚宝、幕府、仪凤三门及会同桥。^⑤

史料二:

(洪武十年八月)癸酉,革在京幕府、金陵二门。^⑥

史料三:

① 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② 四重城垣由内向外包括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学界一般将《明太祖实录》中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月“庚子,置京师外城门驯象……凡十五门”(《明太祖实录》卷201,第3007—3008页)作为外郭建设之始。

③ 参见礼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第27—32页。

④ 如杨国庆认为:“初建的新城范围……至此,新城南至……此时的京城城门,据不完全记载,有……幕府……等城门名。”参见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98,第1673页。

⑥ 《明太祖实录》卷114,第1880页。

临川守御千户胡朝宗受赂，法当死，命于幕府门外行诛。帝适出三山门。朝宗父母拜伏道侧，涕泣哀诉，老无所依。帝特悯之，免朝宗死，杖一百，俾终养其父母焉。^①

在这三则史料中，前两则出现于《明太祖实录》中，有明确时间记录，可以直接作为探讨幕府门存在时间的依据。最后一则出现于《皇明宝训》，虽没有直接说明史料的发生时间，但将本段史料与《明太祖实录》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可以得出《皇明宝训》中史事的发生时间，进而推出幕府门的存在时间。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洪武二年八月）临川守御千户胡朝宗受赂，法当死。上出幸三山门。朝宗父母拜伏道左，涕泣哀诉惟有此子，死则老无所依。上闵之，俾减死论，终养其父母。^②

将《皇明宝训》和《明太祖实录》中内容大体相同的史料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皇明宝训》的记载更加详细，不仅有胡朝宗即将“行诛”的地点，而且朱元璋对其免死后的具体责罚“杖一百”也有记载，这些都是《明太祖实录》所缺载的。

第二，《皇明宝训》的部分内容史料价值高于《明太祖实录》，已有学者做过研究^③，就本段史料来说也体现了这一结论。笔者认为这段史料很可能是《明太祖实录》参考《皇明宝训》并加以删减而成的，至于《明太祖实录》的删减标准为何，已无从考察。

综合上述两点认识，笔者认为《皇明宝训》与《明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胡朝宗受贿当死，朱元璋法外开恩”是同一事件，《明太祖实录》参考《皇明宝训》，在删减的同时，意外保留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既然《明太祖实录》中洪武二年（1369）八月是胡朝宗事件的发生时间，那么用之于《皇明宝训》中，同样可以作为幕府门存在时间的依据之一。

再看诗文：

诗文一：

严陵徐先生大年尝被召至京师，与修《元史》，书成上进，诏择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还甚力……都之大夫士相与祖饯幙府门外……^④

诗文二：

兵后念念记别离，两年音问不相知。武昌楼下初来日，幙府门前忽见时。上国花开同醉

① 《皇明宝训》卷1，顾炎武：《皇明修文备史》，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8册，第17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44，第875页。

③ 参见杨永康：《洪武七年官修〈皇明宝训〉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④ 高启：《送徐先生归严陵序》，《高太史凫藻集》，《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1929年影印本，集部，第1543册，第16页。

少，大江潮落独归迟。莫嗟握手还分手，此会从前岂有期。^①

上述诗文都是明初文人高启（1336—1374）的作品，其中“幙府门”即是指“幕府门”^②，虽然都提到了幕府门，但是并没有时间的记载，因此只有分别考证而得出。

首先考证诗文一。徐尊生，字大年^③，是明初浙东著名的文人，其参与纂修《元史》后辞官归乡之事，除高启《送徐先生归严陵序》外，宋濂《文宪集》卷8《送徐大年还淳安序》^④和乾隆《淳安县志》卷10《儒林》^⑤都有记载。在诗文一中，既然徐大年“修元史书成……以老乞还”，从而“都之大夫士相与祖饯幙府门外”，所以《元史》的成书时间，应当就是徐大年告老还乡、士大夫们在幕府门外为其饯行的时间。据宋濂《元史》“目录后记”所载，洪武三年（1370）七月书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工”^⑥。因此诗文一中幕府门的出现时间很可能是洪武三年。

其次考证诗文二，该诗是高启在金陵为送别老友“董卿”而做，诗人将二人战乱离别、战后偶遇、最后依依惜别之情抒发得十分真切。其中幕府门就是他们再次重逢的地点，对于这次重逢，虽没有时间记载，但可以从高启在南京的活动中得到一个大致推断。《明史·高启传》记载：“高启……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嫌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⑦由此可见，高启在南京的活动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二年（1368）受诏入京编修《元史》^⑧至洪武三年秋书成辞官返乡。

① 高启：《金陵喜逢董卿并送还武昌》，《高太史大全集》卷14，《四部丛刊》，第1541册，第60页；又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1230册，第180页。但在《四库全书》中的文集名是《大全集》，此外还将“忿忿”写作“匆匆”“幙府门”写作“幙府山”。除“匆匆”是“忿忿”的异体字，进行改写对文意影响不大外，将“幙府门”写作“幙府山”对本文影响甚大，故需做一简短辨证。本文认为《四部丛刊》正确，《四库全书》错误。理由有二：其一，《四部丛刊》中的《高太史大全集》是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明景泰间徐庸刊本影印，而《四库全书》中的《大全集》则是清抄本。相比之下当然明刊本更可靠。其二，从具体文字来说，《四库全书》将“幙府门”在《鳧藻集》中抄作“幕府门”，而在《大全集》则没有更动，仍作“幙府门”。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反映出《四库全书》更加随意或是抄写者不同所致。这种直接更改原文的做法从《四库全书》将“忿忿”写作“匆匆”中也能看出。总之，笔者认为高启《金陵喜逢董卿并送还武昌》中的“幙府门前忽见时”应当以《四部丛刊》为准，《四库全书》写作“幙府山前忽见时”可能有误，错误原因或许是抄写者抄错字所致。

② 古代“幙”与“幕”“莫”三字通用。如蒋赞初在研究幕府山名称起源时说“由于古代的‘莫’‘幕’二字相通，可以认为幕府山之名应始自东吴”[蒋赞初：《南京史话》（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李蔚然在研究幕府山地理位置时认为“地券中的‘莫’亦作‘幙’，或作‘幕’，字意相同，三字通用”（季士家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478页）。

③ 据乾隆《淳安县志》记载“徐尊生，字大年，号赘民，老曰赘叟”（“中国地方志集成”第1编，第62册，第442页）。可知徐大年本名徐尊生，高启反复称之为“徐先生”是否是“徐尊生”之误，待考。

④ 参见宋濂：《文宪集》卷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466—467页。

⑤ 参见刘世宁修，方燊如纂：乾隆《淳安县志》卷10，“中国地方志集成”第1编，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年影印本，第62册，第442—443页。

⑥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4678页。

⑦ 《明史》卷285，第7328页。

⑧ “洪武二年，太祖诏修元史……征山林遗逸之士……高启……为纂修官”。参见《明史》卷285，第7317页。

笔者认为，高启与“董卿”的幕府门偶遇很可能发生在洪武二年至洪武三年之间，而不会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之前或之后。原因在于诗中所提“兵后”“上国”暗示二人的相会是在战乱基本平息、强盛的大明王朝建立之后，鉴于洪武元年（1368）高启尚不在南京，因此洪武二年前二人不太可能相逢。此外，自洪武三年辞官返乡至洪武七年因作文被牵连而诛，这段时间高启基本在家，“授书自给”。在这三四年时间中，已经因辞官和赋诗讽刺得罪了朱元璋的高启，应当不会贸然再回南京了。^①

经过考证，既然高启与朋友在幕府门的偶遇发生在洪武二年至洪武三年其在南京参与编修《元史》期间，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幕府门的可能存在时间。^②

综上所述，从文献中可以得出幕府门的五个存在时间，分别是洪武二年、洪武二年至洪武三年、洪武三年、洪武八年（1375）、洪武十年。因此，笔者认为幕府门最迟在洪武二年就已经存在。

（二）幕府门存在时间的实物证据

在从文献中推测出幕府门迟至洪武二年就已经存在后，笔者又在实物中发现了幕府门存在的更多信息，这就是印有“幕府”字样城砖的发现。城砖是明初建造南京都城城垣中一项最大宗的建材，初步估算全城约耗城砖上亿块，这些城砖产地不一，后人通过对现存城砖上因当时“物勒工名”制度而留下砖铭文的研究，发现造砖单位（以地方的府、州、县，工部及军队卫所统计）已经达到200个以上。^③在众多的造砖单位中，包括在京诸卫所辖南京各城门千户所烧制的城砖。在这些城砖的铭文中，都有各城门名称的简写。在杨国庆、王志高所著《南京城墙志》的统计中，涉及幕府门的砖铭文有“（洪武）元年幕府一号、幕府朱所、幕府邵所、幕一号、幕府二、幕二西、幕府三号、莫三、幕四”^④。笔者再查《南京城墙砖文》，又发现了幕三号、元年□幕一号（反体）、幕五号的砖铭文和拓片。^⑤

在众多涉及幕府门的砖铭文中，“元年□幕一号”砖有照片为证，其真实性无可质疑，所以可用作探讨对象。^⑥（见图1）。

鉴于幕府门于洪武十年被革除，笔者认为“元年□幕一号”中的“元年”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吴元年（1367）”^⑦，第二种是“洪武元年”。这两种可能都存在，试图否定掉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无论是哪种可能，“元年□幕一号”砖铭文可以提示幕府门最迟在洪武元年就已经存在了，这比笔者从文献中得出的幕府门存在时间又提早了一年。

（三）幕府门年表及性质推测

如果将幕府门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生命体进行研究的话，那么将它遗留于文献与实物中的时

① 据贾继用考证“高启洪武三年秋辞京至洪武五年春移居城南前一直索居江上”。“洪武六年……春，自城南移居夏侯里。”参见贾继用：《高启年谱》，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71、78页。另，笔者按，这里的“江上”指的是苏州吴淞江，“城南”“夏侯里”也均在今苏州。

② 贾继用认为“按《金谱》……《喜逢董卿》（卷十四）……系于本年”（贾继用：《高启年谱》，第69—70页）。其中“本年”即洪武三年，既然《喜逢董卿》作于洪武三年，那么诗人与董卿相逢于洪武二年至洪武三年之间应当是更加没有问题的了。

③ 参见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284页。

④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293页。

⑤ 参见杨国庆主编：《南京城墙砖文》，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6—258页。

⑥ 前引文中“（洪武）元年幕府一号”，笔者没有见到过实物，不能确定其真实性。

⑦ 《明太祖实录》卷21，第311页。



图1 “元年□幕一号”砖

说明：本图引自杨国庆主编《南京城墙砖文》，第258页

间线索串联起来，便可以大致勾勒出幕府门的成长过程，而这对判断它的性质极为有利，这里将前文的研究加以汇总，做一年表：

表1 幕府门年表

序号	时间	纪年	事件	出处
1	1367 或 1368	吴元年或 洪武元年	“元年□幕一号”砖 铭文的发现表明幕府 门已于这段时间存在	杨国庆主编：《南京城墙砖文》，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6— 258页
2	1369—1370	洪武二年 至洪武 三年	高启与朋友董卿在这 段时间内相逢于南京 幕府门	高启：《金陵喜逢董卿并送还武昌》， 《高太史大全集》卷14，《四部丛刊》， 第1541册，第60页
3	1369	洪武二年	胡朝宗犯法，朱元璋 命于幕府门外行诛	《皇明宝训》卷1，顾炎武：《皇明修文 备史》，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 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第 17页
4	1370	洪武三年	徐尊生修《元史》 毕，辞官返乡，南京 士大夫们为之饯行于 幕府门外	高启：《送徐先生归严陵序》，《高太史 凫藻集》卷2，《四部丛刊》，第1543 册，第16页
5	1375	洪武八年	置行用库于幕府门	《明太祖实录》卷98，第1673页
6	1377	洪武十年	革除幕府门	《明太祖实录》卷114，第1880页

通过年表，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从幕府门大半程的“生命”历程可以发现，洪武元年是幕府门除了洪武十年被革除以外的最关键年份。“元年□幕一号”砖铭文表明吴元年或洪武元年间幕府门就已经存在。那么它的始建年代应当至少等于或早于洪武元年。由于史料中并无洪武元年建设幕府门的记载，而且洪武二年至三年幕府门就已经发展为南京主要城门了，加之“元年□幕一号”砖确有制造于吴元年的可能，因此笔者推测幕府门的建设和规划很可能早于洪武元年。

第二，从年表中发生于幕府门的事件可以看出，幕府门是当时金陵最重要的城门之一，因为它既是迎来送往之处，又是执法行诛之地，还是设置行用库的热闹场所，这一切都显示幕府门的重要性和使用功能的多元化。

根据上述两个结论，笔者认为，幕府门既然可能建设于洪武元年之前，是金陵重要的正式城门，那么它的性质应当就是朱元璋吴王时期（1364—1367）的新城城门。^①也就是说，幕府门最初是作为王城之门而存在，只是大明开国，南京被立为都城，新城的性质发生转变后，才由王城之门转变为都城之门（即京城门）的。在幕府门的身上，性质发生了两次截然不同的变化，而并非始终如一。

三 幕府门的地点考证

在得出幕府门是新城城门的性质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它在哪里？很可惜尽管有含“幕府”字样城砖的发现，但发掘者并没有提供这些城砖的发现地点。^②同时笔者曾试图将幕府门与文献中的“幕府桥”^③、南京北郊的幕府山联系起来，但尚无证据显示幕府门、幕府桥和幕府山三者有关联。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只有回到对幕府门的基础研究上，首先从幕府门的城门性质着手，通过对已知新城城门的初步排查，确定大致位置，再结合对前面所利用史料信息的进一步发掘，勾画出幕府门的城门特征，最后实地考察，找出与这些特征最符合的城门地点，提出假设，完成对幕府门的地点考证。下文便是笔者的考证过程。

（一）对新城城门的排查

那么，究竟如何确定幕府门在新城城门中的大致位置呢？笔者认为在新城城门分布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只有用排除法来进行。将新城分为东、南、西、北四面城墙，逐一考察每面城墙，排除掉可能的建设地点后，最终锁定大致的位置。（见图2）

首先排除从清凉门至通济门的西、南面城墙。在这两面城墙中不大有可能会再建设一个幕府门。因为它们是对南唐旧城的沿用，据史料记载：

明初建为京师，乃益廓而大之……案以上三城（聚宝门、三山门、石城门）本南唐南

① 所谓新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新城，即朱元璋在吴王时期为配合新宫建设而改筑原应天府旧城形成的吴王之城。狭义上的新城，即新城城墙。本文有关新城的研究见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元末明初南京新城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16年；又见拙作《元末明初南京新城初探》，《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增刊。

② 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南京神策门外瓮城城墙上较多的含“幕府”字样的城砖，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详，待考。

③ 洪武十七年（1384）春正月“壬寅，应天府言，京师大中、昇平、幕府、金川、百川、云集六桥年久将坏，请修治之”。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59，第24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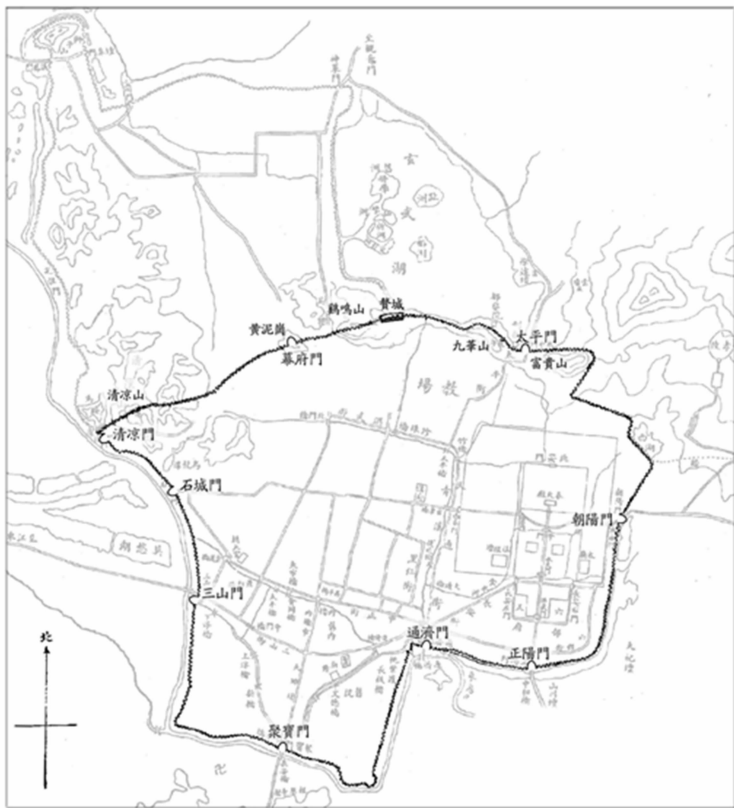


图2 元末南京新城示意图

说明：本图在朱俛《金陵古迹图考》（中华书局，2015年）“明朝都城图”的基础上改绘

门、水西、大西诸门也。明初拓城，惟此三门仍旧而更以新名。^①

明建都城，惟南门、大西、水西三门，尚沿其旧，即杨吴据广陵时徐知诰所建也。^②

鉴于史料中的“明初”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一定确指明朝1368年建国以后，实际上还包括了“元末”这个时间点，因此吴王新城时期是可以纳入古人“明初”概念中的。此外，无论明“京师”还是“都城”，与吴王新城有着时间相继、空间继承、主体延续的关系，新城建设就是都城建设的早期阶段。^③由此可见，新城在沿用南唐旧城西、南两面城墙的同时，其中的三座城门也没有变化，只是更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加入一个幕府门。

由通济门至太平门段的新城东墙。这段城墙属于新城的扩建范围^④，有可能加入一些新的城门。然而这段城墙之中，各重要部位都已有城门，虽未必尽于新城时期建设，但各座城门设置目

① 莫祥芝、甘绍盘修，汪士铎等纂：同治《上江两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3页。

② 陈文述撰，欧阳摩一、管军波点校：《秣陵集》，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③ 参见拙作《元末明初南京新城与京城关系考论》，《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增刊。

④ “（至正二十六年，即1366年）丙午八月庚戌朔，拓建康城……故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参见《明太祖实录》卷21，第295页。

的明确，历史沿革清楚，不大可能与幕府门有关。如东墙之中有通济门、正阳门、朝阳门、太平门^①。其中通济门是迎秦淮水入城之门；正阳门是与皇城正南门洪武门对应之国门；朝阳门门外是陵区所在地，“为杂役人员和守陵驻军故特设此门”^②；太平门介于覆舟山（今九华山）和钟山之间，是出入新城东北的必经之地。由此可见，这些城门都各有用处，分布合理，正如李蔚然所说“其实明都城 13 门除易名的前代门址外，新设城门置于何地，均有内在原因”^③。总之，在新城东墙范围之内，所有重要位置均在当时或后来设有城门，这些城门沿革清楚、用途明确，似乎很难再有幕府门的存在空间。

最后，在基本排除西、南、东三面城墙之后，只剩下由太平门至鸡鸣山，再由鸡鸣山过黄泥岗（今称鼓楼岗）达清凉山，最后至清凉门的北墙。这段北墙笔者认为它不仅存在于新城的规划之中，而且已经于 1367 年 3 月新城主体建设完工之前建设完成，鸡鸣山北面横亘二百余米的赘城便是北墙存在过的实物证明。^④（参见图 2）在研究这段长达 4 公里多的北墙时，笔者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决，那就是这段北墙的城门哪里去了。除了两端的太平门和清凉门，中间一定会有城门的存在，没有城门，就无法由新城通往广阔的西北地区，更不能出龙湾、入大江。新城的北墙如此重要，其中至少应当有一至两座城门以便于通行。城门问题不能解决，笔者所认为新城北墙的存在就缺乏依据。可惜由于新城北墙在明初新城改造中基本被拆除，没有留下城门存在的实物证据，因此在要破解北墙的城门难题只有等待新的发现。

幸而“幕府、金陵”门难题的出现与新城北墙城门之谜相契合，这两座消失的城门会不会就是新城北墙之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至少幕府门是新城之门，而新城北墙又急需城门的发现来增强其存在的可能。幕府门研究为笔者破解新城北门之谜同时也为解决幕府门自身的位置困惑提供了可能。再回到本文对新城四面城墙的排除上，经过排除，笔者认为只有北墙最可能是幕府门的存在地点，但具体在北墙的哪个位置则需要在对幕府门自身特征的进一步考察后才能得出。

（二）从文献中判断幕府门的特征

笔者认为，文献中所体现的幕府门特征共有 5 个，分别是中部、要道、北门、近河、送别。下面分别做一解释：

1. “中部”特征。所谓中部，即幕府门位于南京城的中部。这一判断源自于前文所使用的史料二。本则史料表明了朱元璋在南京设置行用库的具体位置。行用库是明代官库之一，据文献记载“专市民间金银”^⑤。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其设置地点应当是市场、城门、要道等人员密集之处。

在了解行用库的基本情况后再看史料二，显然洪武八年行用四库的分布情况完全符合行用库设置的要求。聚宝门位于城南，自南唐以来一直是都城南门，这里商贾云集、人流不息。仪凤门位于城北，是南京城的北大门，直通龙湾，是进入长江、物流囤聚的必经之路。会同桥同样位于城南^⑥，只不过它与聚宝门的区别是，聚宝门是都城南门，而会同桥位于都城南部中心地带。会

① 太平门位于新城东北角，本文算作东门。

② 李蔚然：《论明代南京城》，《东南文化》2001 年第 7 期。

③ 李蔚然：《论明代南京城》，《东南文化》2001 年第 7 期。

④ 有关南京赘城的性质与成因问题，参见拙作《南京赘城考》，《地域文化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⑤ 参见《明仁宗实录》卷 3（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上海书店，1982 年影印，第 87 页。

⑥ 这里的“城南”是以当时京城的总体格局着眼的，并非南唐旧城的“城南”。

同桥跨运渎水而设，也是老城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人员密集之处。由此可见，行用四库中的三库分别设置在城北门、城南门、城南中心地带，那么鉴于前三库分开设置的原则，第四库也应当与前三库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只有三个选择，城东、城中、城西。由于城东是皇城政务区，是皇宫和中央衙署所在，平民百姓相对较少，且从城门设置上如前文所述也没有幕府门的存在可能，所以城东不会设置行用库。城西只有三山门、石城门，虽然此二门因靠近外秦淮比较繁华，有设置行用库的可能，但因三山、石城二门是南唐旧有城门，明初沿用，与幕府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第四库即“幕府门行用库”也不可能设置在城西。

最后只有一种可能，即“幕府门行用库”设在城中。倘若这种假设成立，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难题，既然仪凤门是城北门，那么怎么又会冒出一个城中的幕府门呢？难道还有一道城墙从城中将京城一分为二吗？笔者通过对新城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就很好理解了。在洪武八年的时候，始自洪武六年（1373）的新城改造刚刚开始不久，此时旧有新城的规模仍在，新城北墙尚未拆除，当然北墙中的幕府门就是存在的。然而新城改造的目的是建设更为宏伟的京城，新城西北角的仪凤门已经被纳入未来的京城构架之中，此时正在重新规划或建设。正因为新城（指京城）、老城（指新城）同时存在，这才造成了洪武八年城北仪凤门、城中幕府门同时设置行用库的“奇怪”现象。由此可见，不了解新城的建设过程，就无法理解“城中”为何会有幕府门的存在。

2. “要道”特征。之所以说幕府门是交通要道，除上文所提到的在此处设置行用库，而行用库必设置于人流密集、道路通达的地带外，前文所引用的诗文一中士大夫们争相在幕府门外设宴欢送徐大年返乡，也说明此处是出行的重要通道，可以想见当时道路两旁一定是酒家林立、彩旗招展、人流不断。

3. “北门”特征。所谓北门，就是新城北门。之所以做出幕府门是新城北门的推测，是因为前文史料三中“临川守御千户胡朝宗受赂，法当死，命于幕府门外行诛”^①的记载。胡朝宗受贿赂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案件，判其死刑，只是依法而为。在幕府门外行刑应当是一次常规的死刑案件。如此的话，幕府门外就应当有一个刑场，而刑场的设立一般是在北方，即城北。如洪武十七年三月丙寅朱元璋诏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公署于太平门外时解释说“太平门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阴肃，故建于此”^②。由此可见朱元璋是主张将执法部门设置在城北门外的。至于洪武十七年（1384）改建之前，执法机构设置在哪里，史书中并没有说明，笔者认为很有可能就在幕府门外，正因为洪武十年幕府门的拆除，新城北墙从清凉门至赘城西端逐渐消失，才有可能在洪武十七年将原有的执法机构全部改建于太平门外。所以由刑场的位置位于城北而推测幕府门就是新城北门应该是可以成立的。^③此外，在幕府门外设置法场也很符合前

① 《皇明宝训》卷1，第17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160，第2487页。

③ 除文献记载之外，由“幕府门”之“幕府”名称也可以推测其位于北门的方位。尽管古、今“幕府山”位置不同，今之幕府山“西接宝林山，西北靠长江，南临卢龙、石头二山”，古之幕府山“自张王村至下关车站附近的郭家山一带土山统称为莫府山”。但它们的实际位置都在南京城北，且古之幕府山并不特指某一座山，鉴于幕府门的起名很有可能与其处在被称之为“幕府山”的小山丘有关。笔者后文经考证认为幕府门位于鼓楼岗（明代称“黄泥岗”）上，“黄泥岗”在明以前的俗称未必就不可能是“幕府山”。所以这条思路既解决了“幕府门”名称的由来，又可以有力的佐证其是新城北门的属性。笔者的观点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贺云翱师的口述。他提醒笔者幕府门的名称可能是判断其北门属性的有力证据，并为笔者介绍了古、今幕府山的大致方位。第二，获得贺云翱师的启示后，笔者查找书籍，吸纳了李蔚然对幕府山的具体研究成果。上文有关古、今幕府山方位的引文可参见季士家主编：《金陵胜迹大全》，第477—478页。

文所推断的幕府门是交通要道的特征。只有将法场设置于人流密集的交通要道，才能更好地起到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

4. “近河”特征。所谓近河，就是靠近河流。古人交通不发达，城门之设置，必于靠近河流处方为最佳。南京京城十三门中通济、聚宝、三山、石城等门均靠近河流，如有条件的话，幕府门也应当如此。诗文二中高启送友人董卿的离别诗中就隐约透露了这种可能。诗文中说“武昌楼下初来日，幙府门前忽见时。上国花开同醉少，大江潮落独归迟”。其中“大江潮落独归迟”颇具玩味。由于此诗是送别之诗，因此“大江”应当与诗人和朋友的相见与分手地点有关。显然此次二人在南京相逢于幕府门，那么鉴于幕府门交通要道、迎来送往的性质，他们的分手之处也应当在幕府门。幕府门外可通大江，以便友人登舟远行，沿长江逆流而上，返回武昌。只有如此，“大江潮落独归迟”才会是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病呻吟。所以笔者根据高启送别友人的诗文，判断幕府门外应该有河流直通长江。

5. “送别”特征。在了解完前面“要道”和“近河”特征后，幕府门的“送别”特征就很好理解了。正是因为具有送别的功能，京城的文人雅士们才会争相设宴为返乡的徐尊生送行，而高启才会与朋友董卿相聚及分别于此。这一特征是幕府门作为新城北门和交通要道的功能属性所决定的。

（三）通过实地考察而推测幕府门位置

本文在前面的研究中，做了两项工作。第一，确定幕府门在新城北墙。第二，从文献中钩沉出幕府门的五个特征。通过实地考察，笔者认为只有北墙范围内的鼓楼能够满足幕府门所具备的五个特征。

首先，鼓楼能够满足“中部”和“要道”的特征。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鼓楼位于京城中心，杨国庆认为：“明代的钟、鼓楼，距朝阳门（今中山门）、仪凤门与钟阜门（对于鼓楼而言，两门基本等距）、聚宝门（今中华门）基本为几何状的等距离。”^①对于明初朱元璋将钟、鼓楼设置在京城中心的原因，郭华瑜解释道：“这样，当黄泥岗上的鼓楼鼓声响起，在明南京城不规则的城池中，即使远离宫城与繁华的居民区，也能闻声作息。同时鼓楼的位置距离明南京外城的十三个城门距离大致相等。”^②

由此可见，认为鼓楼位于南京城的中部是没有问题的。此外，鼓楼既是京城报时的机构，也是南京城由城中通向城西北的交通要道。从《洪武京城图志》的“街市桥梁图”可以看出，由北门桥通往城西北的交通主干道中，有一条就直接通过鼓楼下的城门洞（参见图3），因此说鼓楼是“要道”一点也不为过。

其次，鼓楼能够满足“北门”这个特征。从“街市桥梁图”和现存的鼓楼可以看出，无论是鼓楼还是钟楼，其下部都有门洞，既有门洞，又为当时“车马通行之通道”^③，那当然符合城门的特征，这种类似城门的建筑形制使得牟复礼一度认为鼓楼就是新城北门的所在。^④

① 杨国庆、王志高：《南京城墙志》，第226页。

② 郭华瑜：《明鼓清碑——南京鼓楼的前世今生（下）》，《紫禁城》2012年第3期。

③ 郭华瑜：《明鼓清碑——南京鼓楼的前世今生（下）》，《紫禁城》2012年第3期。

④ 牟复礼认为：“我们知道，现在位于城内离城墙很远处的鼓楼，当时计划要作城墙的北门，在新的笔直的北城墙中间偏西一点（见地图1）。”参见[美]牟复礼著，方骏、王秀丽节译：《1350—1400年的南京》，《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3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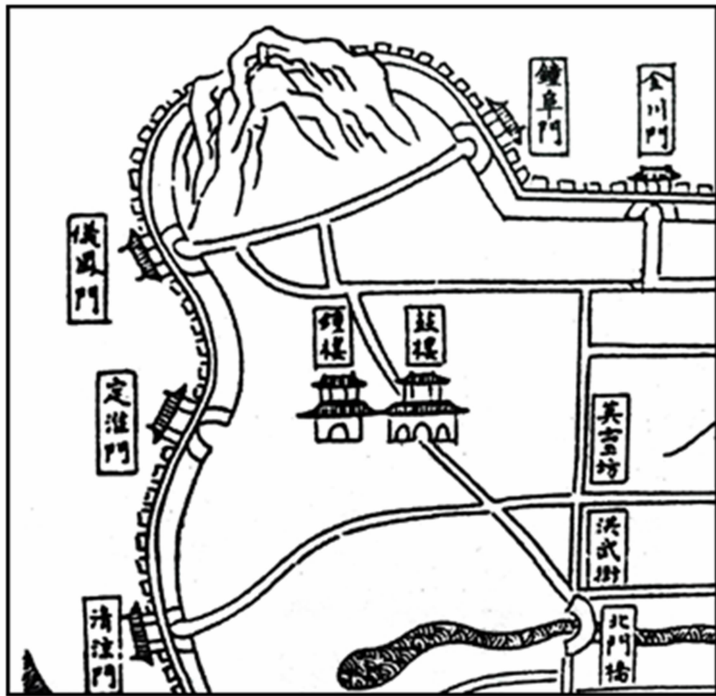


图3 “街市桥梁图”局部

说明：图片截自影印清抄本《洪武京城图志》之“街市桥梁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第8页

再次，鼓楼能够满足“近河”的特征。这个“河”并不是长江，而是“金川河”。蒋赞初认为：“金川河原来是南京城北的大河，上游直抵鼓楼岗、五台山和清凉山的北麓，并接通玄武湖和长江。”^①由此可见，建筑于鼓楼岗上的鼓楼离金川河的上游很近，通过金川河可以坐船直达长江。因此，鼓楼的“近河”特征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最后，鼓楼既是交通要道，又有北门特征，还离金川河很近。那么说此地具备“送别”的特征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新城北墙范围内，只有鼓楼较为符合幕府门的五个特征，当然，鼓楼不可能是幕府门，因为幕府门革除于洪武十年，而鼓楼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②但是鼓楼所在的地点鼓楼岗（明代称黄泥岗）很有可能就是幕府门的所在地。至于如何解释鼓楼与幕府门性质完全不同却建于同一地点，笔者推测是因为幕府门于洪武十年革除以后，洪武十五年鼓楼建设时就其原址而成。因此，如今南京鼓楼的地面以下可能还留存有新城时期幕府门的遗迹。

^① 蒋赞初：《南京史话》（上），第13页。

^② 参见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6，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

四 幕府门的消失原因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十年八月癸酉“革在京幕府、金陵二门”^①。文献并没有提及革除幕府门的原因，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两座城门可能被堵塞了。^②

笔者认为，凡是被“堵塞”的城门，只要整段城墙还在就很容易被发现。像幕府、金陵这两座京城正式且重要的城门，必然高大宏阔，若被堵塞，不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倘若认为南京现存的城墙已经不完整，被堵塞的城门很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与城墙一道被完全拆除，那么明清时期城墙是完整的，但文献中除有后湖小门被堵塞的记载外，并无提及其他被堵塞的重要城门。而后湖小门与幕府、金陵门也不大可能牵强的联系在一起，因为幕府、金陵二门早在洪武十年就被革除，而解放门北侧的城墙即后湖城直到洪武十九年（1386）才“新筑”^③，位于后湖城南端的后湖小门必然也是洪武十九年以后才建设，这与幕府、金陵二门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幕府、金陵二门在洪武十年不是被“堵塞”，而是可能被拆除了。至于为什么会被拆除，这就需要结合笔者对新城改造的研究。^④始于洪武六年（1373）的新城改造，随着洪武八年中都的罢建，朱元璋将主要精力放在新城改造即京城的建设上，此时南京城墙的建设速度加快，掀起了新一波的建设高潮。由于新城改造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北墙拆除，而从现有鸡鸣山段所保留的赘城可以看出，这次北墙的拆除是从西向东、有序进行的。但北墙拆除的速度并不快，可能是考虑到新城北部扩建的城墙尚未完工，原有都城仍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因此不可能一下将北墙全部拆除，而是根据城市建设的整体需要，缓慢而有序的进行。至洪武十年，北墙拆除工程进行至鼓楼岗，原设于此处的幕府门可能同时拆除，这才有了文献中幕府门被革除的记载。洪武十五年，北墙拆除工程基本结束，鉴于鼓楼岗位于城中的重要地位，才于此地建设鼓楼，而鼓楼有可能就建于幕府门原址之上。

小 结

当推测出幕府门的消失原因后，对幕府门三大难题的探讨也已完成。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城门性质、城门地点还是消失原因，仅是笔者一家之言，其中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譬如笔者虽然提出了幕府门名称的可能来由，但尚无更多的证据予以证实。鉴于幕府门在新城乃至京城城门中的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笔者将继续发掘史料，充实自己的论据，以幕府门研究为起点，对更多南京新城时期的城门进行研究。

（作者单位：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南京城墙研究会）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明太祖实录》卷114，第1880页。

② 参见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第110页。

③ 关于“新筑后湖城”地点的考证详见拙作《明初南京新城扩建问题考》，江苏省文物局编：《江苏省文博论文集2017》，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4—59页。

④ 相关研究见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元末明初南京新城研究》第五章《新城加固与改造研究》，第100—136页。